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21世纪的世界经济

[美] 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杨炯 译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读数据核字(圆)第 圆号

[illegible]

封面装帧摇王晓阳

定价 圆肆圆元

中文版前言

自从本书英文版杀青、并于 1994 年 9 月出版以来,不少重要事件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经济和政治的面貌。虽然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本书英文版所着重阐述的许多重要的发展也不可小觑,例如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经济和政治事务、对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的加快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我不仅要探讨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面貌的一些新的发展,而且要把英文版中强调的一些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以阐述。不管怎样,我想指出,任何一本著作都无法完全跟得上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发展迅猛改变人类事务的速度。

本书问世后最重要的事件是美国于 1994 年决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宰藉) ,这个决定是早该作出了。美国政策的大转变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和美国可以分享重要的经济利益,还因为美国赞赏中国在改变计划经济、引入重大的市场改革方面已经作出尝试,并继续阔步前进。尽管严重的政治问题使这两个经济大国分道扬镳,但是两国都领悟到为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如果低估两国在建立长期和睦关系方面的困难以及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和观点的必要性,那是十分愚蠢的。

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社会的重大一

步,可能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经济发展的成功主要靠一国的政策和自己的努力,但融入到广阔的世界经济中去能够有力地促进该国经济的顺利发展。现有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贸易和外商投资对一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极其有益的。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的经历表明,出口、吸收外资和向国际经济开放是十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比经济上孤立要强得多,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并且为该国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途径。虽然一国政府应当(至少我个人这么认为)最终保持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粤:廖正兴,英:Arthur Lewis)说过的那样,一个国家如果不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发展经济将是极其困难的。^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充分参与世界经济以及使中国人民享受到加入该组织能带来的经济等方面好处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国际经济环境的性质同样重要,世界上其余国家将如何接受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迅速增长的现实,尚需拭目以待。美国会不会继续容忍每年对华贸易高达大约 250 亿美元的巨额贸易赤字和收支逆差?如果国际贸易失去活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还会再每年把数十亿美元资金投在中国吗?世界经济是否会像近几十年那样开放下去,贸易是否会扩大,基本上将决定这类问题的答案。换句话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获得多少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数十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

本书的主题思想是: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国内或国际市场的存在需要依靠政治稳定和多国政府的扶持政策。开放且稳定的

国际经济的政治前提条件有三个。首先,一个或几个国家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导,领袖国的任务是提供稳定的国际货币,促进自由贸易,确立管理国际商务的公平和不偏不倚的规则。其次,稳定的国际经济必须建立在主要经济大国合作的基础上,经济领袖国不管多么强大,单枪匹马是无法管理世界经济的(至少是无法长期管理的),而必须与其他重要的经济大国携手合作。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必须相信自由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商务对他们有利。如果美国、中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民逐渐认为全球经济对他们不利,他们对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支持就会迅速消失。

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政治基础仰仗美国的领导、美国和冷战盟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相信世界经济开放能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但是不少事件的发展使他们对于这些牢靠的基础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产生了疑虑。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领导和盟国之间的合作都明显地衰退了。同时又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扩大领导者队伍,让其他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发挥领导作用。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扩大和加深,美国、西欧和其他国家一些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已经怀疑开放的国际经济是否对它们有益,例如,在世纪之交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怀疑经济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好处。现在布什政府开始执掌美国,就这些政治事态提出疑问就特别适得其时。虽然克林顿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经过多次迟疑不决之后——终于决心(尽管不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使美国参与世界经济,但布什政府对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的立场在我撰写本文时尚不清楚。

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首脑会议于1993年12月的失败,对世界经济的政治基础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件特别令人

担忧的事。这次会议原计划处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遗留下来的未曾解决的许多问题 ,并且开始所谓的“新千禧年回合”。当各国贸易部长济济一堂时 ,要提交他们讨论的议程洋洋大观 ,其中有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 ,审查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 ,从而制止滥用这些合法的贸易规则 ,允许最贫困国家的商品能免税进入工业国市场等等。不幸的是 ,许多史无前例的政治发展使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首脑会议一败涂地。如果你要了解西雅图首脑会议失败的最显著表现——马路上出现了强烈的抗议游行——你必须懂得所谓“新贸易议程”(至少在美国的)的重要性。

由于国际贸易量增加和贸易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各国社会中去 ,国际贸易日益与政治上一些敏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并且逐渐与国内(特别在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新贸易议程”脱颖而出 ,议程包括了劳工标准、人权、环境和国家主权这类极有争议的问题。新贸易议程的一些支持者坚定地反对自由贸易 ,甚至彻头彻尾地奉行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大部分有组织的劳工就是主要例子。但是 ,多数鼓吹解决新贸易议程上这个或那个问题的人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进行激进的变革 ,这些变革可能大大削弱现有的贸易体系。评审新贸易议程和环境的各种问题导致了激烈的政治辩论 ,说明了贸易体系面临着难以消除的严重威胁。^④

“公平的”劳工标准、人权和环境保护等议程 ,都涉及这些政治上敏感的重要问题是应当与传统的贸易问题一起处理 ,还是另行开会讨论解决。一方面 ,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特别在美国和西欧 ,坚决认为应当把这些问题纳入国际贸易体系中讨论 ,贸易自由化应当服从于人权等具体问题的实现。另一方面 ,大多数经济学家、政府和企业集团坚决反对把这些问题放到国际

贸易谈判中来。他们担心 ,不管某些集团的动机多么好 ,劳工标准、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重要问题 ,将会被而且正在被地地道道的保护主义者所利用。事实上 ,这些不可调和的立场所造成的僵局导致 1994 年克林顿总统要求国会批准“快速通道”授权遭到失败。本来 ,要是国会批准这个授权的话 ,是会大大有利于贸易协议谈判的。

在美国 ,环境保护主义者越来越强烈地反对现有贸易体系。^猿美国批评现有贸易体系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接受自由贸易原则 ,同时认为环境保护问题应当纳入贸易谈判中去 ,如果不能比自由贸易优先考虑的话 ,也应当一视同仁。这个阵营还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应更加向公众开放。另一个阵营则持较激进的立场 ,他们反对自由贸易 ,把自由贸易看成对环境的威胁 ;他们也反对世界贸易组织 ,把这个组织看成是强大的公司利益集团的工具。这个阵营里的人赞同美国新孤立主义保守派的看法 ,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侵犯了美国的主权。总的来说 ,这两个阵营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已成为在为环境贸易问题展开政治斗争时的一股可怕力量。

环境保护主义者最初在西雅图提出的那些问题是严重的 ,必须由各国政府致力去解决。然而除了全球气候变暖和海洋污染之类少数特别重要的问题之外 ,其余几乎所有的环境问题都能在国内或区域内十分有效地得到解决 ,核废料和其他危险的废物、水污染、空气污染、倾倒有毒垃圾和释放二氧化碳等严重问题与国际贸易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西雅图抗议最强烈的一批人是反对砍伐木材、特别是反对“滥采滥伐木材”的那些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府向木材公司(例如在阿拉斯加州)提供高额补贴、许多发展中国家里缺乏土地的农民的毁林行为和国家发展战略造成的。尽管过度砍伐森林的主要责任应由各国

政府来承担,但世界贸易组织还是成为“代人受过的对象”。而且,即使环境问题真的与国际贸易相关(例如石油污染海洋和买卖濒临灭绝的动物),世界贸易组织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威去处置这种事情。然而,通过国际代表大会这类机制却可以有效地处理这些紧迫的问题。关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规则的国际协议就是通过另一条途径解决环境和贸易关系问题的一个杰出事例。^源

劳工标准问题尤其在美国已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工会首先强有力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其次真正关心发展中国家童工状况的人权鼓吹者也不放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西雅图街头的抗议者大多是美国劳联—产联动员来的工会会员,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威尼(先录社杂增藏译)后来对西雅图会议的垮台感到兴高采烈。国际劳工组织曾制订过劳工标准,但是大多数劳工标准倡导者和反对使用童工者认为该组织没有处理这些问题。而且,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甚至未曾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全部标准。尽管某些劳工标准和禁止使用童工的倡导者真心地关注许多国家的劳工受压迫的状况,可是其余的倡导者只不过利用这个问题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手段而已。

许多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不同意把劳工标准和人权纳入贸易谈判中。经济学家担心在贸易谈判时考虑劳工标准问题会使达成贸易自由化协议这个已经十分艰巨的任务不必要地更加复杂化,并且可能为对低工资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提供方便有效的根据。发展中国家强烈谴责某些人力图把“西方的”标准强加给它们。它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劳工标准的建议通常由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提出,用来削弱发展中国家以低工资劳动力和仅仅提供最低限度福利待遇为基础而形成的比较优势。

劳工标准、人权和童工这几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提得合理的,这一点必须搞清楚。而且,有些国家无疑犯了“社会廉价倾销”的过失,即通过不给予工人基本的权利和像样的工作条件来获得竞争力。但是,矫正这种过失是极其困难的。由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强烈反对把劳工标准和人权问题拿到世界贸易组织中来讨论,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就会破坏该组织的效率。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雅图的许多抗议者谴责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侵犯了美国的主权,同时却鼓吹世界贸易组织把劳工标准和人权强加给犯有过失的发展中国家!不用说,支持把工人权利纳入贸易体系中讨论的立场与反对这么做的立场,事实上是很难调和的。

最后,劳工标准、人权和童工这几个相关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教育和经济发展双管齐下。一般来说,劳工标准很高和尊重人权的国家是最发达的国家,部分地因为它们很富裕,具有强大的、关怀他人的中产阶级。在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里,父母亲通常需要子女的赡养,像贸易制裁这样的外界干预不会取得成效。^缘在短期内,最佳的解决办法是消费者组织对那些侵犯应有的人权、利用童工和滥用其他国家劳工标准的公司企业施加压力。

新贸易议程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遭到了环境保护主义者、人权鼓吹者、奉行保护主义的工会和超保守的新孤立主义者之间邪恶联盟的激烈抨击。正如 员怨年 员月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外面激烈的抗议以及 圆园年 源月在华盛顿的抗议情况那样,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成了全世界遭到挫折和忧心忡忡的群体的避雷针,这些人希望世界能摆脱目前的不幸。西雅图抗议者的要求是相互矛盾和难以达到的,从要求完全取消世界贸易组织,说它

不民主和损害美国主权 ,到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干预许多国家的主权性事务 ,以制止滥采滥伐森林、江河湖泊污染等破坏性行为。对责怪全球化给自己和世界带来一系列问题的群体和个人来说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令人忧虑的全球化的象征。

国际经济组织无疑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引起了争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界银行为贫困国家的许多项目提供资金 ,又引起了质疑。世界贸易组织的若干决策或许也犯了错误。这就需要改革 ,使这些机构对于非经济事务更加负责和更加敏感。然而 ,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和经济团体对这些机构所作的大规模抨击是毫无根据的。例如 ,把未能减轻穷国的债务 ,发达国家没有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打开市场 ,以及没有防止世界银行所资助的开发项目造成环境破坏 ,都归咎于这些机构是不对的。这种失败的责任要由各国政府来承担。由于富裕的工业国不肯拨出必要的资金 ,减轻债务的努力遭到了阻挠。向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商品开放美国市场则受到工会和其他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对。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开发项目造成环境破坏 ,始终很少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援国政府的优先考虑。如果想解决世界经济中诸如此类的问题 ,抗议者应当把注意力直接针对应当最终负责的各国政府。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尽管西雅图街头抗议者吸引了世界贸易组织 1999 年 5 月会议大多数与会者的注意力 ,可是这次会议完全失败的主要责任应由经济大国 ,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来负担。出于国内政治原因 ,克林顿政府竭力迫使这次会议把“ 劳工标准 ”问题列入未来贸易谈判的议程 ,他在接受一家报纸记者采访时不负责任地提

及美国可能对没有达到某些劳工标准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 , 尤其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反感。它们认为克林顿总统的言行出于保护主义动机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西雅图谈判破裂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的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迈克·穆尔(迈克尔·穆尔) 缺乏工作经验。还有一些因素是西雅图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 , 对议程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以及由 150 多个会员国出席的庞大会议难以控制。

主要经济大国 , 特别是美国和欧盟 , 不愿意认真考虑贸易自由化问题 , 这是西雅图会议失败的关键。经济大国各自提出与另一方有矛盾的不同议程 , 因此妨碍了会议取得成功的结果。克林顿政府把取消欧洲农业补贴和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的问题摆在正式议程最前面。但是在开会时 , 克林顿总统甚至使这种正式议程为劳工标准问题让路。再则 , 美国政府拒绝讨论日本和其他国家所痛恨的美国广泛滥用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条款作为保护主义手段的行径。^远 克林顿政府还反对欧盟把竞争政策列入议程的强烈要求 , 却支持有利于美国出口集团利益的狭隘议程——金融服务、信息技术、飞机和农业——几乎毫不关心别国的利益。

在西雅图会议上 , 同样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 , 日本和西欧国家坚定不移地反对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的农产品开放自己的市场。在欧盟内部 , 人们认为 , 通过给予农民大量补贴来保护农业是实现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措施。在日本 , 执政的自民党需要获得日本农民的选票 , 所以反对向别国的稻米和其他农产品开放市场。主要经济大国找不到解决这些根本性分歧的妥协方案 , 注定了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下场。对美、日、欧这三个主要与会者来说 , 国内政治目标总比贸易自由化更重要。

1993 年 11 月在我写作本文时 , 贸易谈判取得重大突破的前

景特别不妙。虽然纺织和农业等许多重要部门的贸易壁垒降低了,但是仅仅限于有势力的选民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水平。美国和西欧——两个最大的贸易强者——在许多棘手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而且,美国和欧盟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关注进口商品,特别是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商品的影响。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也日益醒悟不能开放自己的市场。东亚经济危机的经验使许多国家更加关注开放本国经济的危险性。^苑振兴贸易自由化进程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布什政府坚决致力于贸易自由化。它的经济议程包括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这个问题本书在第八章里讨论过。但是,要想使这个问题取得进展,使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都需要“快速通道”授权。可惜,许多民主党人反对快速通道授权,除非条款中包括向劳工标准和环境提供保护,但是共和党人又反对这样的条款。类似的僵局挫败了克林顿总统取得快速通道授权的努力,但愿布什总统能办成克林顿总统未能办成的事情。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抗议行动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那就是现在人们普遍地感到,像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已经完全不适应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了。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国际机构面临着许多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大大影响到它们的未来。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一是学者们所谓的“民主赤字”,即国际经济机构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它们没有对任何民主选民承担责任。西雅图抗议者使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引人注目。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现有国际机构的权威与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之间的差距;尽管在 20 世纪下

半叶经济权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特别是经济权力开始向亚洲转移 ,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权和责任继续主要掌握在美国手里 ,其次掌握在西欧手里。另一个问题是机构改革。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有关 ,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左派和右派都对该组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为了有效的决策和尊重成员国政府保守国内事务秘密的意愿 ,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基本上都是秘密开展工作的。人们担心 ,关于贸易、货币和其他重要的经济事务的谈判可能搅乱和严重动摇全球市场。例如 ,改革汇率的建议很可能导致货币市场大破坏。这种担心进一步加强了秘密操作的偏好。尽管在许多情况下秘密操作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 ,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和社会福利正听凭厚颜无耻的国际官僚秘密决策的摆布。这种日益加深的忧虑激起人们对全球化作出了强烈不利的反应 ,并且破坏了国际组织所管理的全球经济的基础。

1993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生动地说明了在寻求解决“民主赤字”问题时所碰到的种种困难。除了发动新千禧年回合的贸易谈判外 ,各国贸易部长的西雅图秘密会议还开始携手合作 ,努力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并加强该组织在贸易争端解决程序和其他事宜上的权威性。世界贸易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影响力比任何其他国际经济组织都大。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需要金融或其他形式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确具有重大的影响 ,可是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事务的权威性涵盖每个成员国 ,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哪个国家不执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的决定 ,该组织就有权对它进行惩罚或处以罚款 ,其他国际

组织就无此权限。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司法权和管理权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不管西雅图许多抗议者怎么想,世界贸易组织在众多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是最民主的,也许联合国大会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一百三十多个成员国中,每个国家只拥有一票;主要经济大国没有正式的特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实行加权表决制,这种制度大大有利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然而,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更加民主,但关于该组织的合法性仍旧存在不少质疑。

西雅图抗议者提出的最重要要求之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言外之意,还有其他国际组织的决定——都应在公众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除了公开性以外,许多抗议者还要求允许非政府组织(包括处理人权、劳工和环境问题的那些民间机构)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决策过程,应当允许非政府组织就审议中的有关事情提交意见概要或提供证据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争取更多地向民众讲明情况的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事实上,如果要让更多的公众接受国际组织及其决策,认为它们合法,就必须要做到更加公开,更多地向民众阐明情况。增加公开性会碰到极大的障碍。有些国际组织效率低下,已口碑极差,如果让较多的人参与,将会使决策大大复杂化。此外,国际组织的决策涉及一些主权国家。例如,为了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更透明,作为争端的国家就必须透露它们以及国内有势力的选民集团希望保密的那些敏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成员国政府可能失去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信任,而想在该组织之外去解决它们的分歧。

尽管解决民主赤字问题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但是既要提高工作效率,又要增加透明度是极难实现的。这两个似乎互相

矛盾的目标是欧盟贸易专员帕斯科·兰米(~~马科·兰米~~)在西雅图会议惨败之后提出的。如果从世界贸易组织不是直接对选民负责这个意义上说,该组织的确是不民主的。然而,很难想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做到直接对选民负责。尽管在西雅图的非政府组织断言,应当使国际机构向选民负责,但它们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认识到,几乎每一个负责管理我们这个高度复杂和一体化的世界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甚至国内组织都具有民主赤字特征,并不直接对公民负责。这种组织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委员会、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但是,这些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其他国际机构最终会对各国政府负责。在世界各国人民融合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之前,管理世界的最终责任必须落在各国政府的肩上。

国际机构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现有国际机构权力的分配和国际经济权力的分配之间差距日益拉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以及后来修改时,这些机构的权力实质上都赋予了美国和西欧。按照惯例,挑选世界银行行长一直是美国的特权,挑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头一直是西欧的特权,而且这些大权可以阻止它们所不同意的人事任命和任何行动。随着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大的国家)的发展以及获得了更强的经济实力,它们就越来越不满意这种安排,要求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在 1994 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米歇尔·康德苏(~~米歇尔·康德苏~~)辞职后任命谁当该组织新的总干事时达到了严重关头。根据传统做法,西欧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德国财政部官员凯奥·科赫——韦塞(~~凯奥·科赫——韦塞~~),满怀希望他能选上。出乎

意料的是,日本提出了别的候选人,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非同寻常地联合起来另行提名。^愿 尽管美国没有对西欧挑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头的“权利”进行竞争,但是它对科赫—韦塞的资格深表怀疑。最后,挑选了“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德国候选人——霍斯特·科勒(~~亨利·科勒~~) ,争端才得以解决。

在这个看来很小的争端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在负责管理全球经济的那些机构中,哪一国或哪几国占统治或主导地位。^愿 这个问题早就造成美国和西欧的意见分歧。在上述例子中,即使许多欧洲人对科赫—韦塞的为人持保留态度,他们(特别是法国人)仍把让他当候选人看作防止美国日益主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一种手段。此外,西欧人越来越担忧他们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地位的日益削弱。德国人坚持认为,该轮到他们挑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头了,这反映出他们希望世人再次把德国看作为大国。天哪!民族自豪感至今仍与我们难解难分,挥之不去。

其实美国一直是主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 的大国。在几次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危机中(包括 ~~1929—1933~~ 年墨西哥危机和 ~~1929~~ 年后的东亚危机),美国实际上左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在贸易领域,美国发起了每个回合的贸易谈判,并且基本上由它确定议程。再则,美国经常带头对付西欧和其他大国的抗衡,甚至对西欧施加压力,要它们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不过,西欧也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里发挥非同寻常的影响。它们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过去已经是,未来将继续是占主导地位的成员。

美国和西欧继续主导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越来越使日本反感。日本对自己在这些机构中处于

从属地位特别感到不高兴。尽管日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里是第二大捐款国,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当选过除了亚洲开发银行以外其他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头头,甚至也没有被认真考虑过。此外,日本非常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也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地区运作的方式。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美国的影响太深。1998 年,日本提出自己的人选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任总干事,并要求其他亚洲国家支持它的提名。日本新的坚持维护自己权利的做法集中反映出,尽管全球经济均势已向非西方大国倾斜,但负责管理全球经济的国际机构的领导权继续属于西方。如果这些机构打算继续存在下去,有朝一日必须纠正这种权威和权力脱节的现象。在西雅图,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成功地挑战西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当时它们阻止了美国和欧洲提出的重大议题列入议程。

西雅图秘密会议见证了在世界贸易组织受谁主导方面新的、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在巴西、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下,拥有绝对多数投票权的发展中国家的能量成功地调动起来了。尽管它们未能实现自己提出的议程,但它们的确阻挠了美国把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纳入贸易体系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在西雅图发现,它们能够影响管理国际经济的规则,也能阻止违背它们利益的新规则的采纳。发展中国家将来会如何施展这种新发现的力量尚不清楚。但是显然,中国将在这些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围绕西雅图会议惨败而发生的各种事态可能产生了不幸的结果——促使主要经济大国放弃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多边谈判降低贸易壁垒的方法。贸易谈判可能在双边或地区一级按极有利于主要经济大国的条件开展。放弃多边贸易谈判将对世界贸易